

转型经济与农民

(1978—2003)

安希俊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F30-53
A700

转型经济与农民

(1978—2003)

安希伋 著

PA 293/02.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经济与农民 .1978~2003/安希伋著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3

ISBN 7-109-08839-1

I. 转... II. 安... III. ①安希伋-文集②农业经济-中国-文集 IV. F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149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26)

出版人 傅王祥

责任编辑 姚红 张欣 闫保荣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515 千字 印数: 1~1 500 册

定价: 50.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takes pleasure in presenting

An Xiji

Honorary Life Membership



In recognition of outstanding
service to IAAE and to its
object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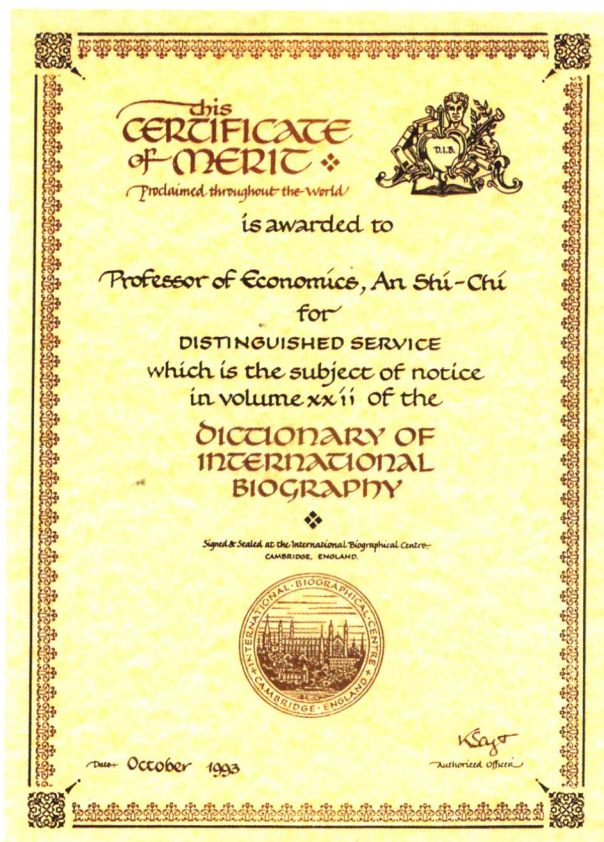
Presented this day of 23. August, 1994.

Attest

Robert V. Thompson
President

Walter J. H. ...
Secret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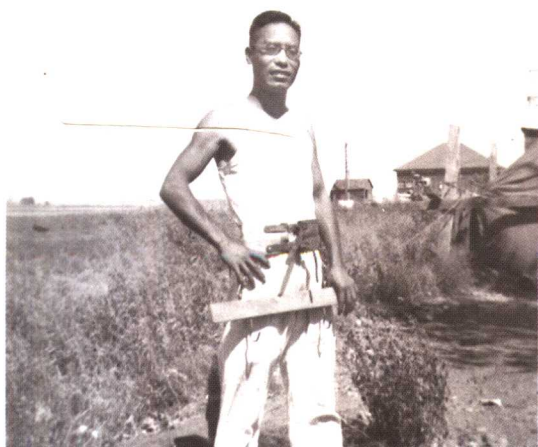
当选为国际
农经荣誉终
生会员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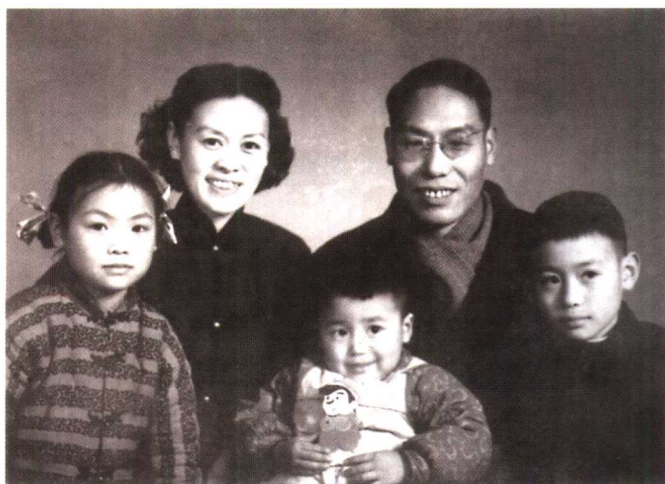
剑桥国际名人录
入选证书



与朋友在美国苹果园打工 (1949)



在美国果园打工 (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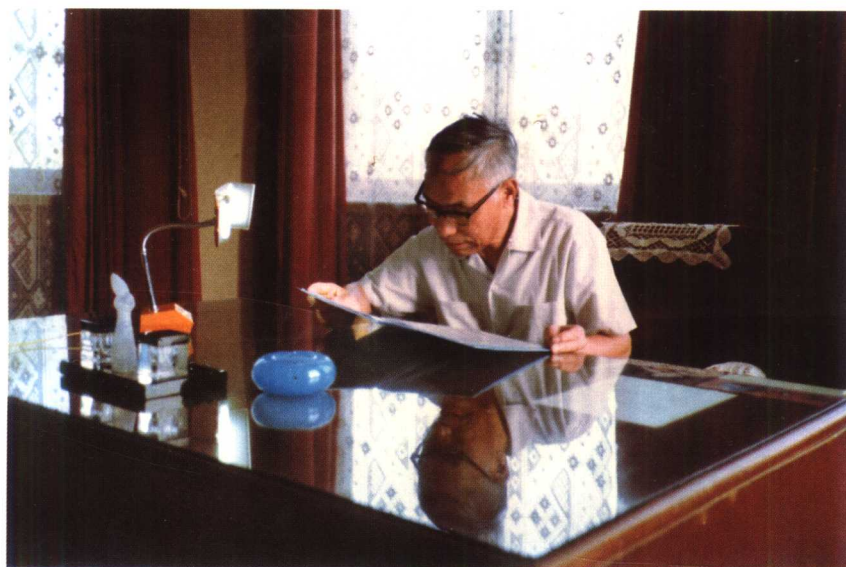
春节全家福 (1961)



作者访问美国斯坦福大学时与食品研究所所长 Falcon 教授合影 (1982)



访问康奈尔大学 (1982)



大连棒捶岛授课
期间（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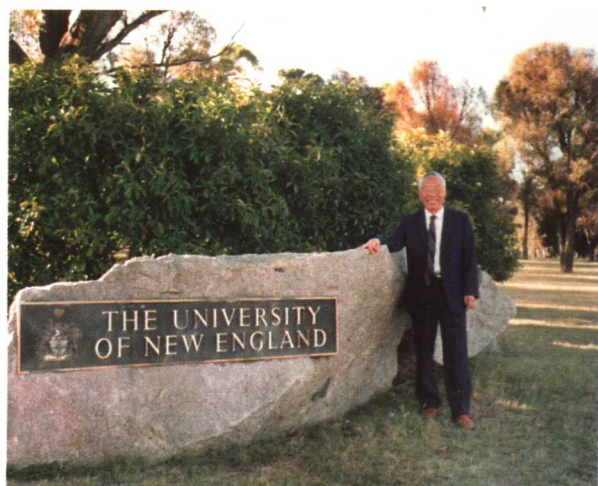
接待 Reisch 等德国教授（1987）



应邀出席在美国 Iowa 举行的
世界食品大会（1988）



德国 Th. Bergmann 教授来访（1989）



访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1990）



中国农业大学庆贺作者 80 华诞 (1995)



应邀在河南省农科院讲授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农业应用 (1991)



指导博士研究生 (1996)



又一个作者指导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 (1997)



为庭院花坛松土(2000)

自 序

这本文集汇集了我从 1978—2003 年间写的 57 篇论文。文集所跨越的这 25 年，正值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农村而言，土地制度从原来的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于一身的农村人民公社制转变为两权分离的土地承包制；物资流动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计划调配转变为市场交换；资金融通从统一的计划调拨转变为资金多元化与一定程度上开放的金融市场；劳动力使用从有计划的用工转变为有限的劳动力市场。这种转变仍在持续进行中。最近，中共十六大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包括上举几个方面的变革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并且规定了体制完善目标。特别是要确立私有产权制度、转变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和农民可自愿结合，建立合作组织。《决定》将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健地发展。

在过去 25 年中，通过实践，中国在农村经济改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堪称一种独特的农村转型经济模式。把这些宝贵经验加以梳理和总结，会为进一步改革提供参考，同时也将丰富国际经验。这本文集所汇集的大多数论文就是作者就此所作的一种尝试，表达了一些个人观点。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一步步收缩其直接主导经济活动的领域，转而强化服务功能；民营经济争取经营自主权，拓展它的活动空间，其中包括农民个人及其合作经济组织在内。这个变革过程也就是市场机制取代行政计划成为经济运行规范的过程。它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并从制度层面上引导均衡、持续发展和资源高效配置。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会有曲折与反复。这些文章有专题研究、政策述评、学术探讨、国际经验评价等。多数文章是为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和特约专题而准备的材料，有少数几篇是为执行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和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为介绍中国经验所写的论文，所以用的是英文。

作为一名从事农业经济方面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我有幸经历了这场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这本文集收入的文章记录了我在这场变革过程中各个时点的感受和认识。为了记载写作的时代背景，文末都注明了写作时间和交流场合。所收入的大多数文章曾在当时各种期刊上发表过。其中有几篇文章

是学术论战之作，例如土地制度问题，有些观点是否偏于一端，还有待时间检验。这次编纂这些文章，为了保持原文风貌，除个别文字修辞之外，都未作修订。

在作者退出专业活动之际，也标志着作者学术工作的终结，为此写了一篇记述作者求学治学生涯历程的短文，也附了一些工作和生活照片。本书得以出版深蒙老友赵树枫先生倡议和北京市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焦守田主任赞助，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谢忱。本书的编印组织工作承北京市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张秋锦副主任和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何秀荣教授协同完成，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刘志雄、沈琼、伦爱新、苏慧代为校对文稿，中国农业出版社农业经济编辑室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辛勤工作，在此也一并致谢。

安希俊

2004年初春于北京

作者求学治学生涯历程（自述）

作者于 1936—1940 年间就读于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陕西省杨凌）。当时该系有从英、德、法、美、日等国留学归来的十位教授。他们各有所宗，百家争鸣。青年教授张之毅讲授并评价美国农业经济各学派的学说，辅导学生阅读原著，翻译论文，还开设专课论述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评价 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农业经济学界的学术大论战。刘潇然教授讲授德国农业经营经济学说和土地经济学。张德粹教授系统讲授以英国、丹麦为代表的西欧农业合作思想渊源和动态，展望农业合作事业发展前景。耳濡目染，兴趣油然而生，这是作者进入这一学科的起点。

1940—1947 年间，作者先后受聘为母校助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重庆）助理研究员、中国经济研究所（南开所迁到上海并扩建后改名）副研究员，并兼任《世纪评论》周刊（南京）编辑，在“时事纪要”专栏下，每期写一篇时事评论。

1948—1949 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系进修经济学理论（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主要系统学习新老古典经济学派学说。在学习产生了一种茫然感觉：又怎样把这套复杂、细密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联系起来呢？曾一时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后来经过假期中在一家果园和一家餐厅打工，接触到美国的现实经济生活，这才认识到：中国还没有形成像美国那样的市场经济运作机制，当然不能把美国经验照搬到中国来。

1950 年初回国后应聘为西北农学院教授。1953 年奉教育部令调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前身）。1950—1998 年期间，先是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农业经营经济学、农村金融学、高等统计学、农业地理学及生产经济学；80 年代后期因应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新形势，才系统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以及作为经济数量分析方法的线性规划和一般均衡理论在农业中的应用等课程。

青年时期，作者有机会做过三次农村调查，获益颇多，并对此后治学态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大学三、四年级期间，利用假期，在张之毅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对当时抗日战争后方仅存的陕西省渭北棉区的棉花生产和运销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并就三原县、泾阳县与高陵县三角地带棉花集散市场的区位变迁历史做了一些研究。随着西安棉纺织厂的建立，棉花初级市场从古丝绸之路上一个重镇的三原转到了靠近棉花加工地的泾阳；西（安）铜（川）铁路通车后，又从泾阳转到了铁路沿线的高陵。后来发表了一篇《陕西省的棉花运销合作》（学士论文）。另一次渭北调查是研究古丝绸之路陕西段（东起朝邑县，西到凤阳县）药材、役畜及茶叶市场发展沿革。调查中又发现许多与区位理论相关的有趣现象。例如，泾阳县本来仅仅是丝绸之路上一个一般县城，只是由于当地水质优异，就成了湖南红茶输往蒙、疆以及俄国必经的加工基地。在泾阳制成的茶砖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从而为泾

阳带来一派繁荣景象。泾阳县商会就设在一家茶庄里。作者为此写了一篇专题报告。这两次农村调查给作者带来了许多启示。看似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原来就植根于平凡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经济变化川流不息，只有从变化过程中才能把握它的脉搏。

1942 年在南开经济研究所（重庆）工作期间，曾为执行当时粮食部委托的一个科研项目，被派到四川省北部地区做农家经济与粮食市场调查。

一个北方人到水乡做农村调查，自然会感到处处新鲜，事事陌生。头一个困难是语言障碍。不是语言音调问题，主要是不懂当地通行的乡俗词语。例如“秋儿”（长工之意），“零儿”（日工），“挑”（计量水田面积的单位）等。并且，到处都是从未见过的事物。例如，在梯田上架起的龙骨水车，有的两部水车连接起来才能把水拉到望天田里；又如，在秋收后的田埂小道上，常看到退佃后的佃农们携儿带女、肩挑手提着全部家产的搬家景象，更是闻所未闻。所幸机遇好，不期而遇先后得到两位排忧解难的老师，调查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调查第一站是合川县，作者住在四川省农科所合川农事试验场，可以就近走访农家。承场长好心帮助，派了一位少年工人做向导。初中文化程度，聪敏、诚恳、热心，实际上是一位解说员，成了作者与农民沟通中不可缺少的桥梁。第二站是广安县，借住在一所乡村小学里。学校厨师是一位有丰富农事经验并充满智慧的老农。作者在调查中碰到一些困惑不解的事情，晚饭后就在厨房向这位老师请教。听了他对提问的解说，常有豁然开朗之感。例如，调查中发现，当地一头水牛每年平均约耕地 40 天，包括借牛、租牛天数，也再无别的活可干，与作者熟悉的北方黄牛四季劳作大不相同。因而饲养费用颇大，牛的工日成本很高。以此请教厨师，他稍作沉思后解答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么！”很显然，对厨师来说这个问题来得突然，可能他没有想到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不说自明的问题。因而才稍作沉思。其实，道理本来很简单，种水田就不能不犁田造田（搅动水田深层污泥），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务农经验；既要造田，就离不开水牛，这是当时当地现实生产条件决定的。这次调查，使作者对于调查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于调查工作人员来说，调查工作本身就是一所学问很深的大学校，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只有深入生活，积累社会经验，才能拓宽视野，从而避免拘于一格和本本主义，展示独立思想。

这次调查历时半年，足迹遍及南充、遂宁等四县城区和九个场（镇），调查了十三个粮食市场。访问农户一百多家，步测水田面积一百多块。按原先设计，取得大量有关农家经济与粮食市场的第一手资料。调查结束后，因工作变动，急需转入新工作岗位，资料整理统计工作还没有完结，就把全部资料封存了起来，只发表了一篇《川北地区水稻、小麦生产成本调查研究》。调查工作几乎无功而返，也是无可奈何。

川北调查工作结束不久，作者被借调到一个研制战后经济建设规划的单位。那时候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人们有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社会上也普遍关注战后经济恢复与建设问题。工业化成了经济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也有的经济学者提出应把农业商品化提到日程。作者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土地利用的远瞻与近瞩》的文章，表达有关工农业关系问题的个人观点。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有关联合国粮农组织筹备情况的内部资料。读后意识到，战后中国将面临一个新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环境。为此写了一篇《二战后世界粮食供需新形

势》，希望引起朝野关注，预为图谋。当然，这些都是业余即兴之作。

1950年以后，主要从事教学工作，逐年积累教学资料，60年代初主编了一本《农业经营管理学》。按农业部规定，作为全国通编教材使用。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北京农业大学迁到陕西省甘泉县清泉沟。据说这就是40年代初大生产运动中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屯垦的地方。到沟后，由于一时不慎，作者桡骨折断，不能再干重活。后得领导照顾，派作羊倌。每天哄羊群上山后，就在山坡漫步或随地坐卧。为了打发时光，想到何不利用闲暇读书。于是就再一次重温《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转念之间，得以增进学业，还化百无聊赖为兴味盎然，顿感心情宁静，生活充实。

1978年之后，教学之余，做了一点编写工作。写了两本书，一为《农业生产经济学》，二为《农业经济数量分析理论与方法》。这两本书的写作，主要是试图结合我国正在迅速展开的经济改革进程，介绍一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运作的机制、经验与理论，设想可能会有可借鉴之处。同时，为了参加对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问题的讨论，1978—1993年间，陆续发表三十多篇论文。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七篇英文论文。主要是论述和评价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与取得的成果。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约40万字，1994年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题为《市场经济与农业》。

从70年代末开始，除了教学工作之外，作者进入了农业经济学术社团性活动领域。1978年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村）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1979—1994年间连续被选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分工主管国际学术交流工作；1982—1994年任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长；1984年受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农村经济顾问团团长。本来这些都是虚职，不过，它使作者有机会广泛接触到了国内外宏观经济领域。对于作者来说，这是又一个新天地。

从此开始，不断地接待外国学者访谈，进行学术交流。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也以研究中国农业为名，前来进行访问。我的理解，这是由于我国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种表现。有些来访活动，具有实质内容。198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食品研究所（Food Institute）所长富尔康教授（W. Falcon）与温洛克（Winrock）基金会经理史密斯（J. Smith）联手访问我农业经济学会，提议与我会建立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与教学合作项目，美方负担全部经费，并派专人常驻中国。请示农业部后，我方表示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不能同意美方提出的合作方案。富尔康教授是一位国际上知名的经济学家，坚持不肯放弃，经过三天谈判，我们最后同意举办一个农业经济研习班，由美方每年暑假期间选派两位教授来我国讲学，我们从全国各院校和科研院所选送40名青年学者入班学习，聘请讲师费用由美方负担，讲习班日常费用由我方负担。这个班持续办了四年，每位学者合计听课约半年。这是1949年以来，我国较早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一次活动。1982年富尔康教授聘请作者担任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当时因国内工作繁忙而婉辞。

从1979年开始，作者参加了几次国际学术活动。1979年秋天，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加拿大班府（Banff）学术中心举行的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第17届大会。这是1950年后我国第一次与国际农业经济学术界接触。除了代表团集体论文之外，

作者为会议写了一篇《中国的种植业多熟制》英文论文。1982年奉农业部令与刘崧生教授和王广森教授组成一个小组，在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资助下，访问了美国东、中、西部四所大学。费时一个月，先后与70多位同专业美国教授们进行了个别学术交流。还访问了几家不同类型的农场。使我们对于国际、首先是美国学术动态有了一个一般的了解。1985年和1987年两次应德国霍恩海姆（Hohenheim）大学邀请，历访德国五所大学和三家科研机构，与30多位德国同行进行了个别交谈。对几家养牛场、养鸡场、养猪场和蔬菜农场及其批发部做了些初步调查。并与霍恩海姆大学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还与德方导师讨论了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选题问题。1987年代表中国农业学会与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当选主席朗·沃斯教授（John R. Longworth）共同主持了在北京市怀柔县举行的农业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IAAE两次大会之间一次常规的中等规模的学术活动，也是我国首次举办类似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了英文版大会论文集——《中国奇迹》（China's Miracle）。我的理解，这表达了国际农业经济学界对我国经济开放改革政策的赞赏和对我国农业发展成就的祝贺。

1988年应邀参加了在美国依阿华州德斯莫伊斯市（Des Moines, Iowa）举行的世界食品大会。这是美国学界和政界为次年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的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国际贸易谈判而做的一次造势活动。虽然作者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主要是谈论中国的农业政策、成就与问题，可事实上也很难回避大会主题。在一次电视直播的圆桌会议上，作者针对美欧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论战明确表达了个人的评价和观点，自由贸易或高额贸易壁垒都行不通，出路在于双方协商，化解矛盾，求得平衡。这些观点后来也形成了文字。会议期间，与依阿华州立大学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并与美方导师讨论了作者早先所派一位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初稿。

1989年与朱道华教授等一道应邀参加在美国南方贝顿如格市（Baton Rouge）举行的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协会年会。会上与台湾大学和中兴大学几位教授进行了一次学术交流。

1990年参加了两次国外学术活动。先是出访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执行学术交流项目，审查作者所派博士生论文进展情况，并顺访悉尼大学农业经济系和会计系，以及新英格兰大学农业经济系。二是应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参加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洲（主要是东南亚）农业发展研讨会。会议期间访问了泰国新经济区。

1994年，在作者缺席情况下，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0届大会上被选为该协会荣誉终身会员。作者把它看作是一种鼓励。

2004年初春于北京

目 录

(按 2003—1978 年顺序排列)

自序

作者求学治学生涯历程 (自述)

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 构建农民致富机制	1
转型经济与农民	6
重温刘潇然著《土地经济学》(代序)	8
我国农村经济转型的经验	10
中国农业发展与制度创新	12
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	15
我国农村信用合作制现状、改革及其意义	18
中国农民状况、动态及其前景	21
农民收入、负担及其社会地位	25
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与挑战》一书写的前言	28
我国农业技术革新之路	29
从保护耕地说到土地使用权变革	33
我国农业的三大变化与若干政策选择	35
中国小城镇建设中的土地问题	41
市场经济与农业	43
农业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基础	52
农业体制改革的范围、深度与过程 (1979—1992 年)	58
农业体制改革的社会经济效益 (1979—1991 年)	64
农业体制改革现状及其前景	71
中国农业改革的道路	76
农村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82
中国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的兴起及其前景	84
我国农业高产、高效与优质问题	91
我国农业产量与农业效益的演变过程、经验及发展	96
一般均衡/系统模拟在农业中的应用	99
吨粮田与农业技术政策	114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过程中运行机制的转换	121
世界粮食市场与我国粮食贸易	122

我国土地制度问题——论土地国有永佃制	128
粮食战略浅议	134
扩大种植业经营规模问题	138
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形势的几点认识	142
农业技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	149
谈谈首都副食品消费与供应问题	154
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前景	158
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兼论农业中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63
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历史与现状	169
论我国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与价格政策调整	173
对于我国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问题的几点认识	180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导论	183
西方农业经济学说史述评	192
论农业投资报酬运动规律与农产品成本变动趋势	199
对于解决当前粮食价格问题的一种设想	208
论农业生产率	224
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234
对 1990 年我国粮食生产与消费状况的一个估计	245
我国农业生产中的经济问题	262
农业生产经济学基本原理	277
试论农业现代化	289
A Note on the State Landownership with Farmers Permanent Tenancy in China	296
Prices, Costs, and Farm Income in Mainland China	298
The Alternatives of food Policy in China and World Impacts	306
In Regard to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Trade Reform	317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 in China	320
Pricing System Refor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ice Policy Adjustment in China	328
Multiple Cropping Pattern in China	343

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 构建农民致富机制

最近中共十六大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明确提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当然还要做大量的细化工作。就农村来说,《决定》可能意味着为农民打开了一扇通向富裕和再一次解放的大门。我想就与三农有关的问题说几点学习体会。主要是学习《决定》第四部分“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的体会。当然也必然要涉及到《决定》其他十一部分中与三农问题有关的原则性规定。

一、土地制度

《决定》第四部分第一项讲的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在过去 50 年中,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过几次结构性变革。回顾这段历史,可能有助于对《决定》精神和背景的理解。50 年代初,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了自耕农制度,耕地归农民所有,由农民使用(1953—1955 年);随即进入了以土地集体所有、集体使用为特征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和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阶段(1956—1977 年);接着是农民拥有较稳定土地使用权的大包干阶段(1978—1984 年);好景不常,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土地使用权不稳定、不规范的土地联产承包制阶段(1985 年以后)。承包制初期,就暴露出许多弊端。1988 年我曾为国务院前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土地制度建设研究会议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是讨论这些弊端为社会经济带来的后果,并提出改行土地国有永佃制的建议。^[1]现在,《决定》在完善农村土地制度项下,作了三条有针对性的规定,从制度层面为发掘耕地潜力,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一是规定土地承包期要长期稳定,并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中外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土地使用权长期稳定,并得到法律保障,农场或农户才会扩大对土地投资,提高耕地质量。例如大包干时期的精耕细作,以及在不同时期往往出现的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建造大棚等项建设,从而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它与不合理土地制度下出现的广种薄收,甚至田地撂荒呈现为鲜明对照。现行土地承包期为三十年,如加以延长,会激励农民更加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

二是规定农民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落实这一规定,一则有利于形成农业规模经营机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二则可为农民转业提供一个便利条件,有利于降低农民占人口中的比重。从宏观经济层面综合来看,落实这一

规定可为经济现代化的均衡发展创造一个有利条件。

三是规定“改革征地制度”，“保障农民权益”。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有一部分耕地必然会转作非农使用。在征地过程中，暂时的无序现象实难防范。但是，乱征地的事如不及时制止，并依法保障农民的权益，势必扩大城乡失衡，加剧社会经济矛盾，从而为社会安定带来隐患。

二、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产品市场

《决定》第四部分第二项规定：“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市场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先讨论三健全中的前两个专题。

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产品市场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关键在于：是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为农业服务并直接进入市场，还是依靠外在的中介组织为之服务，代做农产品贸易工作。《决定》在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进制度创新的同时，指出：要“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旧的要创新，新的要发展。我认为这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一个必有的过渡环节。农场或农户自己组建合作组织，直接进入市场，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的成功经验。在流通领域中，这种农民合作组织，相对于个体经营和集体经营来说，成本比较低，效率比较高，收益比较大，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

我体会，《决定》中说的“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组织”，意味着要为合作组织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因时因地采取适合现实情况的组织形式，例如初级合作组织与高级合作组织、基层合作组织与基层组织的联合组织可以交错进行；各种不同专业的合作组织可以齐头并进。其中包括粮食、果品、蔬菜、肉、鸡等各种专营农产品运销合作组织。国际经验是，他们可从事农产品收集、加工、储藏、运输以及销售（含批发和零售）等项业务。农民通过自己的合作组织直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并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主动调整生产结构。

这种合作组织形式有许多好处。首先，农民不需转业，即可就地扩大就业机会，把经营范围从生产扩展到流通与工业领域。其次，各种农产品从田头流到零售店，甚至到餐桌，经过上举加工、销售等每个环节所创造出来的增值，最后都落入农民手中，很像一根农民增收的链条。这种组织形式不但可从经济上帮助缓解三农问题，而且它还是一所大学校。农民可以从中沐浴市场经济文化，增长市场经济知识，新农民亦农、亦工、亦商，在三大产业中拼打滚爬，自然会多一点主动进取精神、竞争意识和民主概念，少一点、乃至摆脱掉传统中养成的小农意识。通过市场经济文化的熏陶，才能自然的溶入现代社会大熔炉，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

此外，农村合作组织形式中还有农村信用合作组织。金融是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它的作用尤如人体中的血脉系统。《决定》第七部分规定：“逐步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社区服务的地方性金融企业”。多年来农村金融处在一种无序状态中。一方面农村资金不断外流，同时农户又告贷无门。从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面对分散的千百万农户，贷款成本和风险实在很高。很难堵住农村资金外流。据国家统计局编的历年统